



当年通过收听电波方式上课时情形。

我的母校

□邓海波 文/图

又是一年新学期,年轻学子们如汛期的鱼儿,纷纷洄游归校。我也被这股朝气感染着,只是听说如今还有大学为招不满学生而犯愁的事,抚今追昔,回望母校—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,真是感慨“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”。

说起母校在哪里,许多人会满脸自豪。但作为电大毕业生,被问及母校,有人可能会一时茫然,而我和我的电大同学则会伸手指向空中,以高八度的铿锵声音回答:喏,就是这一所!电波能传多远,电大就有多大;伸出手来,就能触到母校博大的胸怀。

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,一面是十多年来的求学者,一面是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。头几年,有些地方高考录取比例低至三十比一。记得我们班五十来人,头两年每年仅3人考上大学。余下的同学见升学希望渺茫,渐渐没了心气,有的临阵弃考,有的进了考场也是“重在参与”。

生活的艰辛与年龄的增长,让我们迈向大学的步履越来越沉重。我和大多数同学相继进入工厂,穿上工装,当上了工人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从黑白电视机和高音喇叭里,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建校、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的新闻传来,得知单位有名额分配、考试难度比普通高考低的消息,我们既兴奋窃喜,又有些急不可耐。记得当时我正好在外地出差,情急之下打电话托同事报了名。我还听说,有人是从隆隆的机器下钻出来,没脱工作服,带着一身油泥就去报名,把电大招生工作站簇新的签字笔捏得墨黑,报名表上也留下斑斑油渍。

通过单位组织的电大统一考试,当我们怀揣电大学生证,正襟危坐听课时,那一刻,尽管是乘着电波遨游知识的天空,但圆了大学梦的庆幸依然难以掩饰。那时开播的电视频道寥寥无几,电大第一届文科班主要以广播授课为主。讲台中央摆上一台收音机,一到早上8点整,喇叭里传来熟悉的电大开播曲,我们顿时兴奋起来,挺直腰杆,翻开讲义,便进入了上下五千年的时光隧道。

在这电波里,我们领略了屈

原的忠魂、秦始皇的雄才、范仲淹的忧怀;见识了司马迁的风骨、文天祥的气节;聆听了李白的吟月、杜甫的悲悯、曹雪芹的叹息;读懂了莎士比亚、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深邃……

当时的电大汇聚了国内众多一流名师。谁曾想,当初未能叩开大学校门的我们,竟能在家门口聆听名牌大学著名教授的讲课,这还真有点“塞翁失马”的意外福分呢!

我们班里清一色都是在职工,电大校方依据这一特点,在文科班实行半工半读:上午捧书上课,下午挽袖上班;写讲话稿是练笔,改宣传稿是作业——这大大拓宽了电大的教学天地,犹如把校园延伸到了车间、厂房和工地。

作为企业,职工中理工科人才济济,文科人才却相对稀少,这一度使企业形象宣传乏力。随着电大教学进度步步推进,我们及时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去,工厂成了我们的第二课堂,工作成了最好的实践。许多同学相继担任了党办主任、企业秘书、宣传干事、电视台编辑和记者等角色,知行合一促成长,“笔杆子”有了两下子,“政工师”有了真本事。

自那以后,企业先后斩获“全国优秀企业金马奖”“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”“受国务院表彰的十四家企业之一”等殊荣,其中每一块锃亮的奖牌背后,都凝聚着我们电大生的智慧与心血,收获季节里的电大已是沃野千里、桃李芬芳。

尽管后来我是“不待扬鞭自奋蹄”,又去了有围墙的大学,再次充电修学了第二专业,有了第二母校。但如今,每当坐下来看电视,在路上听广播时,我常常会上意识地觉得,自己又回到了母校的怀抱。在我看来,与其他名门学府的毕业生相比,我们电大毕业生更多了一层豪迈气——无论走到哪里,电波总萦绕着我们低回,母校总伴随在我们身边,就像母亲总呵护着我们前行。她以有教无类的博大胸怀,施教天下,哺育大众,在提升全民族素质的千秋基业中,功盖天地,声名远播。

记忆中的自行车

□顾亚萍

我曾经有过几辆自行车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毕业后参加工作。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,在一家电子工厂,因为曾经做过保密工厂,后来才转为生产民用产品,所以工厂地址离市区有些远。我们上班坐公交2路车沿江东北路到终点站后,还要再走10多分钟才能到厂,那个时候我非常向往能有一辆自行车,可以方便骑车上班。

进厂要先做二年半的学徒,第一年每月工资21元,以后每年递增两三元。我把每月的工资分成三部分,13元交给母亲,作为参加工作后的家用,3元零用,5元购买浙江省有奖贴花储蓄(零存整取)。当时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大约需要160元,我想用两年半学徒工资积攒下来的钱买一辆自行车。

两年半学徒期满后,我升为一级工,月工资有30.8元,我攒的钱够买一辆自行车了。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,需要凭票才能买到自行车。

父亲在渔轮厂上班,走路上下班也就10分钟时间。征得父亲同意,他的永久牌二八寸自行车先让我用。我约好几个同学兼同事,晚上一起到附近的宁波三中操场去学骑车,练了几个晚上,平路会骑了,就是上下车起步和落地有些不稳。接着要上路实操,我跟着教我们骑车的同事,按捺住紧张的心情,推着自行车上马路。我双手紧攥车把,瞅瞅四下没人,左脚踩在踏板上,右脚往地上前后划拉几下,试了几次还是甩不出从后方上车的漂亮弧线,再也顾不得仪表姿态,右脚往前抬高迅速越过三角档,踩上脚踏板,往前踏起来。在摇摇晃晃的起步中,慢慢地越骑越稳;在人来人往的穿行中,慢慢地越骑越好;在上下起落的动作中,慢慢地越骑越熟练。

这就像人生的弧线,要想划得漂亮,需要多历练。

父亲的这辆半新的二八寸自行车,虽然笨重又有多处锈斑,但我对它爱护有加。我家住在三楼,每层楼住四户人家,楼梯边还有一条长长的、宽宽的走廊。我每天下班到家,扛在肩上,停放在三楼家门口的走廊中,早上上班时再扛下去,每天用毛巾将车身擦得干干净净的,每周还要给钢丝、钢圈上油,让它像新的一样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横涨供销社采购到一批飞花牌自行车,在新江桥下的商店里供货。得知车子尺寸刚好适合,我忙去买了一辆,又去相关部门给自行车上牌照。拿着发票却上不了牌照,原因是发票缺了一角,刚好缺在发票号码上,要去店里换开一张。我到了新江桥下,因为自行车供不应求,早已断货,横涨供销社的这个点已经撤了,要到横涨村去补发票。我一口气来回骑了将近30公里,这也是我学会骑车以来最远的一次骑行,但我没觉得累,一方面因为车子是用新型材料制造的,比起全钢材自行车更轻便,另一方面是我正在办一件快乐的事,心情的愉悦削减了身体的疲惫。

后来也换过几辆自行车,车身越来越漂亮,越来越轻便。我用后座书包架送女儿上幼儿园、读培训课程,用前面加装的塑料篮筐装一年四季飘进厨房的美味烟火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随着工作变动,工资收入增长,我买来摩托车作为上下班交通工具;城市禁摩后,我换了小轿车驾驶。退休后,城市交通更加便捷,家门口就有地铁、公交,我出行更喜欢步行,或乘坐公交、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,自行车从此与我告别,但它划出的漂亮弧线永远是我记忆深处的美好。



资料图片